



跟大师学国学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 著
朱维铮 校订

中华书局



跟大师学国学

梁启超著 朱维铮校订

清代学术概论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朱维铮校订. —北京:中华书局, 2016.6

(跟大师学国学)

ISBN 978-7-101-11831-5

I.清… II.①梁…②朱… III.学术思想-思想史-概论-中国-清代 IV.B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3629号

-
- 书 名 清代学术概论
著 者 梁启超
校 订 者 朱维铮
丛 书 名 跟大师学国学
责任编辑 申作宏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6年6月北京第1版
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9×1194毫米 1/32
印张7 $\frac{3}{4}$ 字数130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831-5
定 价 25.00元
-

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

——“跟大师学国学”出版缘起

这是一套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

“国学”之名，始自清末。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等，与之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等。

晚清民国时期，东西方文化会通碰撞，人文学术勃兴，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们的著述，历经岁月洗磨，至今仍熠熠生辉。我国古代经典，浩繁艰深，而这些著作无异于方便后人接近经典、了解历史与文化的一座座桥梁，其价值自不待言。

遗憾的是，出于诸种原因，这些著作，有的版本繁多，错漏杂见，有的久不再版，一书难觅。有鉴于此，我们特组织出版“跟大师学国学”书系，从中遴选出一些好读易懂、简明扼要的作品，仔细编校，统一装帧，分批推出，以飨读者。

这些作品，大多是一版再版的经典，不仅在文化学术界历来享有盛誉，也在广大读者中间有较高知名度；另有一部分，出自当日名家，影响很大，但1949年后未曾重印，借此次机会，将之重新推荐给大家。

这些作品，有的是为高中生所撰的教材，如张荫麟先生《中国史纲》；有的是为青年学生所作的讲演，如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和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有的是应约为青年人所写的通

俗读物，如吕思勉先生《三国史话》——都是大家名家面向年轻读者讲述，不作高头讲章，也不掺杂教条习气。这正应了曹聚仁先生记录章太炎先生所作国学讲演时所说：

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

这也是本书系立意所在——让年轻一代享受大师们的文化成果，学习大师们的治学方法，感知大师们的智慧才情。朱自清先生说得好：“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对当今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提醒。

我们希望，这些作品能在新的时代，帮助年轻朋友熟悉经典，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9年4月

《清代学术概论》导读

朱维铮

清学史的经典性名著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初稿著成于一九二〇年十月^①。正如作者自述，它本是作者应邀为友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写的序言，就是说原来没

^① 1920年10月4日梁启超致张东荪书，首次提及正为《改造》作一文，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今方得一半”；同年10月18日致胡适函，已提及蒋方震将书稿给胡看了；可知成稿必在这年10月中旬前。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下引简称梁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920、922。

有打算写成一部书^①。

然而原题《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的这篇序言，也如作者自述，“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②。

“独立”后的长序，已被梁启超当成一部著作，因而在交给他和蒋方震共同主编的《改造》杂志连载的同时，又寄交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单行本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出版，负责的编辑是陈叔通^③。

显而易见，梁启超的这部著作，只能说是无心插柳的一个结果。倘若以今律“古”，这个结果甚至不配称作硕果，——难道薄薄五万来字的一本小册子，引用他人论著或本人旧说，多半都不加注，可以认作学术专著吗？

岂知历史效应出人意料。《清代学术概论》，虽属短书，形式又不合后世的学术教条，在出版后却在读者中不胫而走。谁都知道当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主持者很有“经济”头脑，他们在梁启超死后第三年即一九三二年，赶在中华书局将本书收入《饮冰室合集》而印出之前又抢先出了本书第八版，便可证本书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① 参看《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自序，原载《改造》三卷三期（1920年11月），作期署“民国九年十月十四日”，后收入改题《清代学术概论》的单行本。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页1~2。

② 前揭拙校注本，页1。参看蒋方震《〈清代学术概论〉序》，已收入本书附录。

③ 1920年12月9日张元济致梁启超函，谓此稿已付印，书名已称《清代学术概论》，并由此函可知处理这部书稿的是陈叔通。见梁谱，页926。

畅销书未必赢得雅俗共赏。某些俗不可耐的劣作，借助权力、金钱或“关系”，而被趋炎附势的所谓传播媒介“炒”成畅销书，在中外的例证比比皆是。

严格地说，作为总结清帝国二百六十七年学术变迁史的《清代学术概论》，既非同类课题的首出之作，更非具有专门史经典意义的佳作。

当然，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改革家兼政论家的名望，可能是促使本书畅销的一个原因。如胡适在一九二三年所撰《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变迁大势》一文中，论及梁启超在清末《时务报》、《新民丛报》所作政论文的效应所说的，“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

但文章与学问，属于并不同归的殊途。梁启超从学习桐城派古文而化出更为直捷明快的“新民体”，在自幼诵习八股制艺的晚清读书人看来，确实有梁启超自赞的“魔力”^①。但正如梁启超与乃师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时期倡导的不缠足运动的效应那样，裹小脚的妇女抛弃裹脚布，固然是惊世骇俗的一种解放，而在提倡“天足”的女权主义者看来，不再裹足的妇女依旧是“小脚女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论著提供的文章范例，那种杂糅桐城派古文与《三国演义》之类小说文体的“新民体”，在清末虽被厌倦八股文程式的青年学子激赏，但在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以后，自然也对读者越来越缺乏“魔力”。

^① “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见前揭拙校注本，页70。

可见,从本书初版以来,四分之三世纪过去了,它不仅仍能吸引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成为他们了解清代学术文化史的入门必读书,而且在学者中间,它的价值也不断上升,乃至成了清学史研究必备的经典性名著,那秘密当然主要不在文字。

不消说,《清代学术概论》所以能够获得雅俗共赏的悠远效应,秘密在于它的内容。梁启超不是思想家,但对中外古今的思想学说都极感兴趣。他也不是纯学者,但也许饱受康有为教导的缘故,尤其爱好考察“学术源流”^①。他是清末的改革家,民初更直接登上国内政坛,直到去世前夜,不仅亲历了从戊戌维新到北伐战争的三十年间中国政局的一切变化,而且多次置身于变化的漩涡中心。他是政论家,也从事实的政治活动,因而他的政论取向,不能不对他的历史认识产生莫大的影响,反过来说也就是“以史论为政论”^②,或者说他观察历史,总以他自己的政治经验作为判断尺度。他其实并不隐讳这一点。《清代学术概论》的作者自序,劈头便说“吾著此篇之动机”,首先是因为接受胡适的劝告,记述自己“实躬

^① 梁启勋由其兄梁启超于1983年携至康有为所设万木草堂学习,所述康有为讲学情形较平实,曾说:“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的‘学术源流’。……每个月讲三、四次不等,先期贴出通告,‘今日讲学术源流’。先生对讲‘学术源流’颇有兴趣,一讲就四、五个钟头。”见梁启勋口述、梁思明笔录《“万木草堂”回忆》,《文史资料选辑》,25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4月。1918年夏秋间梁启超致梁启勋函,述说他下野后在天津家中生活,有三通均说他给儿女讲授“学术流别”或“学术源流”,未一通还强调“吾所讲却与南海有不同”。见梁谱,页864~865。这正好提醒我们注意他晚年研究学术史,没有完全摆脱早年从康有为学习的影响。

^② 此据陈守实师说。陈先生早岁在清华研究院为研究生,导师即梁启超,毕业论文《〈明史稿〉考证》曾受梁启超激赏。1962年陈先生在《文汇报》发表《读〈王荆公年谱考略〉》,着重阐述史论与政论的关系,那命意当得自梁启超。

与其役”的晚清今文学运动云云,即为例证。

可见,《清代学术概论》,并不是一部单纯的论述清代“思想界之蜕变”的专门史著作,同时也是梁启超个人的一部学术回忆录。作者曾在清末舆论界执牛耳的地位,本来就使人们对他在政、学两界的实际经验感到好奇,并且不断歆动学者们的研究兴味,况且作者又强调,他自述这段历史,“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他是否做到了对于“史料上的梁启超力求忠实”^①,容后讨论,但随着不忠实的风气愈来愈成为叙述与己有关的历史的一种时尚,这种“精神”也愈来愈对读者具有吸引力,似也难以置疑。

梁启超与“五四事件”

《清代学术概论》初稿问世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一年有半。

以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涌到天安门前向北洋政府进行示威活动为开端的“五四运动”,它的历史取向与未来效应,海内外学者仍然异说纷纭,但它的导火线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出卖“国权”,则无疑义。

梁启超没有直接卷入北京的“五四事件”,却可说是引爆这次事件的重要人物。因为他这时正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

^① 前揭《清代学术概论·自序》。

问身份,坐在凡尔赛宫里注视着美英法意日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方即所谓协约国的头儿们,如何就曾被德国侵占而后又被日本“承继”的中国领土青岛的主权问题进行争斗。同时又作为京沪名流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的代表,不断将列强间关于“交还青岛”的所谓交涉进程,电告国内^①。

中国曾经站在协约国一方向德奥宣战。因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认输告终,曾使众多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十分振奋,以为随着“公理战胜”,站在“正义”一方的中国,从此不再遭受“强权”的凌侮。那转折点当然首先是和会将主持“正义”,在山东半岛问题上,“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②。然而一九一九年一月开幕的巴黎和会,实际进程正好与中国人民的期望背道而驰,最终证明大战后的世界仍是“强权”占主宰地位。幻灭化为愤怒,当和会终于以北京政府在大战结束前夜已就青岛主权转让与日本订有密约为口实,同意日本的蛮横要求,这时中国人的愤怒,以北京学生涌到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活动为契机,化作决堤的洪水,便是必然的了^③。

然而“五四事件”恰巧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天发生,则属于必然中的偶然。造成这一偶然性的因素很多,而梁启超从巴黎

① 参看梁谱,页 879~884 所引材料。

② 此据梁说,见 1919 年 3 月中旬梁由巴黎致北京政府外交部汪大燮、林长民电,梁谱页 879。

③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第四章,对“五四事件”的过程,有颇详密的考证。见该书周子平等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本,1996,页 114~164。

发回的现场报道,无疑起了引爆作用。

事情要从中国怎么会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这次战争始于一九一四年八月,那时梁启超还是袁世凯政府的内阁阁员。他关注的重心是内政。他在清末本是君主立宪运动的中坚,鼓吹“开明专制”,到民初却化身为拥护共和制的明星。两次君主制复辟,无论袁世凯帝制自为还是张勋以武力拥戴亡清废帝重坐龙庭,梁启超都是讨伐战争的策划者。这既使他博得了善变政客的恶名,又使他赢得了“再造共和”的美誉^①。显然是日本曾以独占中国侵略权益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洪宪帝制的条件,使得梁启超在“护国战争”结束后,便将目光移向外交,力促北京的内阁总理段祺瑞站在协约国一边向德奥宣战。他的理由却还是在内不在外,以为这一来可收到联美制日的效应,保住中国的主权^②。

当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依赖梁启超的策划起兵讨伐“丁巳复辟”得手而再度组阁时,给梁启超的位置却是财政总长,任务无疑是为新的内战筹措军费,因为当时孙中山正在章太炎等支持下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国会与军政府,南北分裂已成定局。梁启超再度显示他的机智,于同年八月十四日即广州军政府成立前夕,说服段祺瑞抢先以中国合法政府名义,发布了由他起草的对德奥宣

① 梁启超于1929年1月19日病逝后,北京、上海均曾举行追悼活动,名流学者所送挽联挽诗极多,大都集中在这两方面。他的“善变”乃人所熟知。唯章太炎以为,他“恢诡谲怪”,实体现“道通为一”,证明便是“再造共和赖斯人”。更有人宣称他入民国后“伟业侔中山”。见梁潜,页1027~1210。

② 这一点下节将再讨论。

战的布告^①。

但梁启超虽能越俎代庖，替北京政府在外交上争得“法统”地位，从而使广州政府难以获得列强承认，却没能做稳“财神”。北京政府财政空虚，而各路军阀却不断向它要钱，作为拥段反孙的代价。梁启超只好违反初衷，向日本银行团借钱济穷，主持签署了“第二次善后大借款”，不消说要以主权做抵押。这当然立即让国人记起“二十一条”，于是舆论大哗。段总理只好牺牲梁财长以保全执政地位^②，时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

那是梁启超官运的终结。虽然他下野后，依然是由进步党变形的研究系头领，直到一九二九年一月不足五十七岁去世，也没有失去从政的兴趣，但主要活动方向却逐渐转为著书教书。例如他辞去财政总长后家居一年里，便曾致力于研究碑刻和撰写《中国通史》，并为他的儿女们讲授“学术流别”，其中有一个题目便是“前清一代学术”^③。

不过梁启超到底难耐寂寞，“中止政治生涯”未及两月，他便与

① 梁谱对梁启超在力主中国参战问题上的言论所录材料极详，见页 796～834。又，1917年8月孙中山率反对北京政府的国会议员南下广州进行护法运动，同月14日北京政府便发布对德奥宣战布告，报载乃梁启超手笔；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举行，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② 1917年11月段祺瑞内阁因内外交困而呈请总辞职，梁启超也“连带引辞”，但结果是梁启超一人去职。他在同月18日再上辞呈中说“中央财政，各种困难皆臻极端”，又说“现在军事方殷，非得有军界尊宿，或与军事关系之人，管领度支，未易收指臂之效”。见梁谱，页 853～855。可知他是被北洋诸军头联手逼下台的。

③ 前揭梁启超致梁启勋第三信：“来复二将讲‘前清一代学术’，弟盍来一听，当有趣味也。”又，同时致陈叔通书，也提及“为儿曹讲学”，“讲题为国学流别，小女录讲义已彪然成巨帙，为新生小生粗知崖略，殆甚有益”云云。均见梁谱，页 865。可知他在赴欧前已开始研究清学史。

朋友筹画组织松社,既讲学,也出杂志,同时“作出游之计”^①。

欧战以协约国得胜告终,给力主中国参战的梁启超带来了出头机会。他很快取得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由政府提供大半旅费,“以个人资格前往欧洲”^②。陪同出游的有六人,都是研究系的名流学者^③。就在他“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的时候,他在天津家中初次会见了特来“趋谒”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④。

梁启超一行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底从上海启程,一九二〇年三月初返抵上海,除去往返舟程,在欧洲漫游了将近一年。

他赴欧本有政治使命,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的头衔便是明证。但他很快发现,这个顾问不好当。原来,一九一八年

①② 1918年2月19日梁致蹇季常函,谓“吾能否成行尚未定,因旅费尚无着”,见梁谱,页860。同年10月10日徐世昌在北京就任总统,11月11日欧战结束,22日广州军政府同意与北京政府休战。梁启超便接连发表声明,力主中国应列席巴黎和会。12月10日上海《申报》报道“梁任公将赴欧洲游历”,说这是他到北京与徐世昌“接洽数次,并与驻京外交团周旋一切”的结果。同日梁致其长女梁思顺函,说他此行“全以私人资格”,但又说经费“公家所给仅六万(银元),朋旧馈赠约四万”,见梁谱,页873。因知他的所谓“个人资格”,实由北京政府委派并获得协约国列强官方同意的。他的头衔便是中国出席巴黎专使团的顾问,因此当时报刊曾说 he 可能代替陆徵祥为首席专使。

③ “同行者张君劢、徐振飞、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并携鼎甫作录事(不带仆人)兼服役”,同上致梁思顺函。张君劢,名嘉森。徐振飞,名新六。蒋百里,名方震。刘子楷,名崇杰。丁文江,字在君。鼎甫,杨维新字。前四人都是梁启超的研究系同道,都有留学日德美的经历。丁文江是留学英国的地质学家。杨维新则是梁在日本的学生。这个七人“考察团”(胡适语),属于当时中国的文化精英。据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他们“到了欧洲后常在一处的还有夏浮筠(元璫)、徐巽言(谔)”,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2,专集之二十三,页38。但全程陪同的为蒋、张、徐三人。

④ 见1918年11月7日徐新六致梁启超函,同月20日胡适致梁启超函,梁谱,页872~873。又,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一册,页327~329。

十月徐世昌任总统后即下令南北休战,并在十一月欧战结束后获得广州军政府响应,双方派员共同组成专使团出席巴黎和会,颇合“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古训。然而历史的教训终究敌不过党派乃至个人的利益,于是专使团又在外国的宫墙里面“内讧”了。

中国专使五人,首席为北京政府前任外交总长陆徵祥,次席为广州非常国会副议长王正廷,而代表中方与日使争论的主辩手,则是驻美公使顾维钧。争执的焦点是中国“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要求和会按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维护国际和平的十四点主张,取消原北京政府与日本订立的密约。操纵和会的所谓四强,英法支持日本,美意同情中国,而主持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更属关键。据梁启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中旬致北京政府的电报,说是根据威尔逊的主张,密约“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①。

就在美国尚未对青岛是否转让给日本一事公开表态,中国外交似乎有利之际,王正廷突然致电上海报界,指斥专使团中有“某些卖国贼”。他攻击的首先是陆徵祥,自在意中,但他的“某些”一词的暗示,据来自广州的解释,则包括顾维钧和梁启超。据梁启超在家信中说,此人“以为大功告成在即,欲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转为

^① 前掲梁致汪大燮、林长民电。关于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专使团的组成及表现,参前掲周策纵书,页115~119。但周书没有利用梁谱提供的某些资料。

人所攘”，因此既排顾、陆，又株连及梁^①。但无论王正廷此举是否出于私心，梁启超面对“谣言之兴”，必须表明立场。

梁启超的机变显然超过王正廷，在四月三十日美英法意四国政府首脑秘密会议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之后，他立即以国民外交协会代表的身份，致电给他的密友汪大燮、林长民，报告这一消息，“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当然包括广州政府所派专使王正廷——引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②。林长民自然会意，得电立即捅给报界，时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③。

北京学生受王正廷指斥的鼓动，相信陆徵祥、顾维钧都属于北京政府派入和会专使团内的“卖国贼”。陆徵祥作为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外交总长，有“卖国”的前科可征。顾维钧呢？他本是著名的亲美外交家，但据广州传到上海的消息，他即将

① 1919年6月9日梁启超致梁启勋函，见梁谱，页880~884。按此函甚长，详述梁启超一行赴欧前半年的情形，内有一节专述“三四月间谣言之兴”，以为将顾维钧、陆徵祥和他本人均指为“卖国贼”的“谣言”制造者是王正廷，而其动机全出于个人打算。排顾维钧是“妒其辞令优美，骤得令名也”。排陆徵祥是“因其为领袖，欲取而代之也”。排他本人是“又恐象山（陆徵祥——引注）去而别有人代之也”。揆诸周策纵书曾指出“代表团内部曾因个职位高低和所代表的不同派别问题发生分歧”，见该书页116注①，很难否认王正廷的攻击不是假公济私。

② 电文载《申报》1919年5月4日。

③ 前揭周策纵书，页123。按，1919年4月22日，陆徵祥致北京政府密电，已报告当天威尔逊责问中国何以与日本订立密约的问题。这表明美国在山东权益问题上已准备转向。4月30日美英法意“四人会议”，果然秘密决定牺牲中国，同意日本在山东“承继”德国权益的蛮横要求。梁启超闻讯立即致电国民外交协会，指名要汪大燮、林长民转告。汪、林都是梁的密友，自然对电文中“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的含义心领神会。林长民在1919年5月2日发表的和会动向评论，使北京的知识界立即明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已经失败。

与北京政府现任外交总长曹汝霖的三女儿订婚,即将转向亲日^①。

中国人本有将“治国”视作“齐家”的延伸的传统,即如受《新青年》熏陶而自命“新潮”的北京大学学生,也没能脱出将家族利益作为判断国政是非尺度的成见。王正廷的指斥,迅速引起北京学生的回应,进而查找政府中的“卖国贼”,确定为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便是顺理成章的。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决定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即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天皇关于“二十一条”最后通牒四周年那天,上街举行反对政府媚日卖国的大游行。岂知出乎广州政权意外,经过林长民迅即将梁启超“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的电文公诸于众,竟使北京学生将在天安门集举行游行示威的日期提前三天,出现震撼中外的“五四事件”,而梁启超也被舆论视作这场爱国运动的直接挑动者^②。

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是否属于辩证法所称的真理,在学者中仍属争论的课题。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相关度,至今也未见专论。但历史的进程表明,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北京学生聚集

① 时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为留美博士,娴熟国际关系而擅长用英语辩论。他在巴黎和会上成为中国专使团的主要发言人,因而成为国人瞩目的外交明星,是自然的。他言不离威尔逊的十四点宗旨,也使王正廷无懈可击。假如梁启超所指属实,则王正廷因妒而诬顾卖国,唯一可中伤的理由是顾的私德。家国不分原是中国传统,因而当时国内报刊盛传顾将成为外交总长曹汝霖的三女婿,将转向亲日辱国,对顾的伤害就是致命的。从周策纵书的引证来看,这一谣言源于王正廷代表的广州政权。但周策纵对此说是非不予置辨,似乎过度谨慎了。熟悉民初人物史的人都知道,顾维钧确实是三女婿,但他是民初内阁总理唐绍仪为自己的三女儿遴选的东床,却不是北洋军头的外事总管曹汝霖为政治功利缔结的姻戚。参看陈瀚一《新语林》,上海书店《民国史料笔记丛刊》本,1997,页97。又可参顾氏的回忆录。

② 时有传说,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乃梁启超用钱收买学生领袖煽动故。